

我加入新亞書院的歷程

我決心研究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是從入讀新亞書院時開始的，之前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對西方的思想、歷史興趣很大，但是到了新亞以後，對於中國不只是知識上的需要，還有精神上的追求，這是新亞書院對我最大的影響。我對中國文化，本來就有一種正面的看法，在新亞書院學習期間更認識到，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必須進行客觀而理性的考察。因此我擺脫了當時流行的激烈態度：非徹底剷除中國舊的傳統，便無法接受新的思潮。

我在北平燕京大學就讀至二年級上學期，1950年元旦我前往香港探望父母。因父親認識錢穆先生，他希望我跟錢先生讀書，所以就建議我申請入讀新亞書院。我家住在青山道，不遠處就是桂林街，新亞書院離我住處很近，頂多只有半里路。因為新亞沒有正式入學試，錢先生自己出考卷，除了中文試卷，還出了個英文題目，後來還發現他親自評核我的兩篇文章，我很訝異，我以為錢先生不懂英文，其實他可以讀一點英文，所以我覺得考試非常有趣。經過考核後他說你可以來了，我就這樣加入了新亞書院。

1950年代的新亞書院十分艱苦。有位上海商人王岳峯，捐了一萬美元，讓新亞租了一棟唐樓的第三與第四層作校舍，上課的教室樓下是舞廳，吵得要命，亂七八糟的。那時候新亞的學生一共也只有二三十人，都是難民學生，連二百港元一學期的學費都交不起，所以多數都是免費的。我進去後也是免費的。先生很辛苦，大概教一課才能拿二十港元，有時候連車資都不夠。這樣情況下我在新亞讀了兩年半後畢業。

那時新亞書院的物質條件很差。想看書，只有去別的地方找，比如美國新聞處，或者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都是英文書。中文書根本沒地方會外借，新亞沒有圖書館，只有錢先生開課，有幾種他的著作，書店可以買到，除非自己有書，否則都靠先生講給你聽。從北平來的朋友，到新亞上了幾天課就不來，說比北京大學的茅房都不如。

物質條件雖然很差，可是老師很有名望，比如錢穆先生，是全國知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史家，著作很多，我們早在中學時就讀過他的書。他在1938年完成，1939年出版的中國通史《國史大綱》，到了1949年，仍是中國大陸最好的中國通史。這本教科書跟他其他專門研究不一樣。他的專門研究很多，著作共有六十多部、幾千萬字。所以我們跟他學習，聽他講課，確實非常有趣。

新亞精神

錢先生非常關心每個學生，對每個學生都希望有所瞭解，瞭解之後才知道該教些什麼，這就是中國古代說的因人施教。我想他受孔子影響很深。孔子對他的學生，同一問題，不同學生有不同答案，並不是他的意見不同，而是針對學生個性而施教。所以從這方面講，錢先生是很體貼學生的，跟他讀書的學生往往能夠得到他一兩句話，終身受用。我個人也得到他很多啟發，這是在課堂以外的事情。他是真正重視人，把學生當活的人格來塑造，而不是灌

輸一套片面的觀念讓你接受。

唐君毅先生，也是非常有學問、有思想的教授，不但精通中國哲學，對西方哲學也有很深入瞭解。唐先生後來在香港還寫過兩本哲學概論，是哲學系很好的教科書，他對黑格爾有很專門的研究。錢先生講清朝學術思想史，唐先生講中國哲學史，這兩門課當時在新亞對我的啟發很大。我之所以後來繼續在新亞讀書，跟這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因為他們代表著中國的人文精神。

1950年代是我思想失落的年代。共產黨剛取中國政權，中國還沒完全統一。以社會主義、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不能說它沒有吸引力；所抱的理想是貧富不能太懸殊，經濟上應該平等，這些理念我也很認同，可是在政治上對共產黨並不瞭解。毛澤東在共產黨到上海後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是我第一次讀到毛的東西，對這篇文章有很深刻的印象，但他所說的新中國的狀況讓我不理解，因他一方面講民主，但另一方面又講專政，在我看來是互相矛盾的，可是共產黨用辯證法，把兩個不同的、相反的理念統一起來，這是共產黨的邏輯。

我當時是希望瞭解共產黨的，但對中國文化是有相當深的認同。原因是我從1937年，即是日本侵略中國那年起，到1946年這九年間住在安徽潛山的官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潛山官莊跟清朝，甚至明朝，相差不遠，沒有電燈和自來水，也沒有任何現代的東西，完全是原始的農村。我在農村住了九年，這使我對中國老社會比較有認識，這大概使我跟同時代的年輕人不同，他們多是在城市長大的，根本沒到過鄉村。1960至1970年代共產黨把年輕人下放到鄉村，但那時的鄉村已經變了，是共產黨管治後的鄉村，不再是我所認識的傳統社會。因為有這個經驗，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有敬意的。我並不相信五四以來所強調的中國要民主科學，必須首先把中國傳統文化全部毀掉，才可消除阻礙。共產黨也認為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離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還差整整一個階段，所以更應該把它丟棄，重頭來過。可是錢先生和唐先生他們領導的新亞書院，採取一個不同方向，認為中國文化未必一定要消滅後才能得到新的東西。這是我在新亞書院得到最重要的早期教育。

錢穆先生寫的校歌「手空空，無一物」，講物質上是空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就像我前面提到新亞書院最初的情況。可我想錢先生的意思還不在此。他的「手空空，無一物」講的是精神上的，一個人開始還沒有找到他要走的路，還非常空虛，在這個空虛中間他就不知道往哪兒走，所以「手空空，無一物」是個很可怕的狀態。他就希望把學生帶出這個狀態，找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路就有路可走了。這就是新亞精神。不同的時代可以有不同的演繹。同時長期流傳的價值也在此。

香港中文大學改制的內情

我當中大副校長、新亞校長，都是偶然的。新亞找我是因為第一代的人，大都退下來，要進入下一代。第二代有一位先生，比我大幾歲，是在校內的，他們希望他來接手。可是當時他不能馬上接班，希望我幫助銜接，過渡一下，我走了，他就可以接下去。所以我就在這樣條件之下，於1973年，同意從哈佛大學請兩年假回到中大。

本來是為了過渡，沒想到突然之間，香港政府要求香港中文大學改制。我重回中大時，有三所書院，每所書院有一位校長，像崇基是容啟東先生，聯合是鄭棟材先生，新亞是我，我們三個人，各管一所書院，各有所重，新亞書院的校長並非由香港中文大學聘任，而是由

新亞董事會提名，徵求大學校長同意。大學校長一般沒有理由不同意，所以書院相當獨立。三所書院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都有院長、教務長、總務長。行政機構多，而且也有不少是重疊的，改革也無可厚非。可是新亞和崇基，特別是新亞，覺得這是一個要把新亞消滅、讓他不能獨立的陰謀。當年的改革委員會，由我出任主席，因為我在中大的兩年恰好輪到新亞校長兼任大學副校長，我不能推辭。改革會整整一年開了一百多次會議。當時的建議是希望學院掌管教學，書院間可以分工。比如新亞擅長人文學科，可發展為文學院，科學是崇基所長，可變成理學院，社會科學屬於聯合。這樣三所學院都有實際的工作，而且都能獨立自主，加起來又是一個大學。我們認為這樣比較合理。參加大學改制工作委員會的有十幾個人，最主要的成員是馬臨、金耀基、陳方正。後來三位，一位當了校長，一位成為秘書長，金耀基後來也做了校長。還有一位重要的成員是我的朋友邢慕寰，當時任經濟學講座教授，也費心設計新制度。這就是當年關鍵性改革的內容。為了這個改革，我受到很多攻擊，不過這些小事情，都過去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提出的改革建議，不獲香港政府承認。香港政府希望把原來的聯邦制（federal system）改成統一制。新亞認為這是李卓敏校長的陰謀，其實據我所知，李卓敏校長也不知情。這是香港政府的最終要求。後來港督還特別為此事邀我商談，政府不滿意改革建議。我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聯邦制是英國的教育家提出來的，現在人人都應用，現在港府要改制，還得尊重聯邦制。如果要重新建立制度，港府必須另聘教育家來設計，但我認為大學改革不能只聘英國人為改革委員，必須要有中國學者參加，才能取信於港人。如果只請英國人來改革香港中文大學，並不合適。港督也贊成我的說法。這就是我在背後幫助香港中文大學改革的工作，我認為無論如何必須讓各書院實質地產生作用。我沒有隱瞞，跟在臺灣退休的錢穆先生，從頭到尾都講述過。我相信錢穆先生瞭解我的立場，知道我不是為了其他的目標（當時有人以為我要做新的中大校長）。港督為了改制，特別請我和我太太去吃中飯，談中大未來，並當面表示希望我繼李卓敏為校長，但是我拒絕了。我說我不會做校長的，我只想回哈佛去教書。這是我在新亞兩年（1973至1975年）最難忘的一件事。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的社會責任

一、保持科學與人文學的均衡發展

全世界的大學，不僅香港，幾乎都重視科學或者某些藝術，因為藝術得到社會支持，人家看得見、可以欣賞，科學當然也有它的實用價值。從這兩個範疇畢業的學生找工作也比較容易，獲得較高的薪水和待遇。雖然如此，人文研究也不能夠忽視。西方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不斷。最早的當然是1960年代以前，英國人講的兩個文化的問題。英國人認為過去人文科學一直佔上風，到了1950年代以後，科學就慢慢領先了，重要的政府職位，或者大學的主要行政職位，也慢慢由科學家擔任。這個重大的轉變引起不少爭議。兩個文化爭論了幾十年，在英國有很大的影響。在中國當然也有反應。但是最後大家感覺到，人文學還是不能放棄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要用兩條腿走路。科技是很重要的一條腿，可是，如果社會對自己沒有通盤的瞭解，只是在目前的、本位主義的、專業方面有所進展，而不知道目的何在、對別人有什麼好處或者壞處，中國人稱這是「盲人騎瞎馬」，不知道往哪兒去了。比如我們要講環保，就是因為科學只管自己專業發展，高於一切，然後就不顧其他的後果。如果社會要作判斷、常識性的判斷，必須有人文學做背景。例如中國的道家，特別是《莊子》一書便有許多尊重「自然」的深刻想法。在西方偏重科學的取向雖然很明顯，但是大家都還主張不要放棄人文學，都還在力爭人文學佔據更大的位置，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美國教育部常

常給獎金，讓大學生在暑假時讀希臘文、拉丁文。

我記得大概是 2000 年，英國文化學者 Peter Watson，寫了一本叫 The Modern Mind 的著作，討論二十世紀全球人文學與科學的發展。他最後也強調，要有新的人文學，其中包括對自然科學一些整體的認識，類似我們中國人講的科普 (popular science)，目的是培養人判斷的能力。我覺得香港中文大學還是要繼續保持科學跟人文學的平衡，特別要加入中國的人文精神。因為我們不是牛津大學，我們的長處不是希臘文，也不是拉丁文，而是中國古文，中國的古典、古文化。看你要怎麼教、怎麼教的活，那就變成活的文化的一部分。你教的很死的話，當然就變成一種大家都沒什麼興趣的專門知識。所以大學不應只講專門知識，要講通識。我們要有通識教育。

其中一個辦法是讓同學們自己舉辦一些小型討論會或演講。單靠課堂去教，效果肯定不會很大。要採取一種思想運動的方式。不是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是思想運動。這個運動是小規模的，可以向整所大學開放。不斷有這種演講，就會引起一種更深層的討論。我們必須分辨科學對話之外還要走上更高的一層——不單是科學、語言這些專門的東西我們要懂，而是要知道懂這東西代表一種什麼意義，在現今的社會條件之下，它可以提高我們在精神上的層次。我想這是一個需要常常有人討論的問題。否則我們大家一般鼓勵的都是專業化，專業化反正與你的職業有關。我認為在不應只是職業觀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怎樣才能夠達到一個更高的思想層次。高等教育最終目的提高人的生活素質，不然的話，學生畢業之後就只會賺錢——當然養家餬口是應該做的事情，不過我想既然辦高等教育，理想應該不僅僅在賺錢上面。

二、結合中西文化

香港中文大學的目標是要融合傳統與現代，結合中國與西方，在過去的五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初到新亞的時候，新亞的校訓以及錢先生、唐先生他們的講話，也強調這一點。1949 年是中國變動最大的一年，在思想上，無論是西化派，傾向英美，還是傾向俄國，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覺得傳統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換句話說，希望把中國傳統的東西，或者封建的東西，掃除乾淨，然後引進西方的價值觀念、西方的制度。這種想法在當時不可能沒有人懷疑，但是懷疑的人卻被視為保守派。1920 年代，中央大學的前身東南大學，有一派也是留學西方的，他們辦了一本《學衡》雜誌，專門跟提倡五四運動的胡適抗衡。《學衡》主要的人物梅光迪就是胡適早年在美國的同學。最初搞文學革命時候，兩人發生重要分歧。在香港的錢先生、唐先生，他們認為最好是中西結合。認為中國的事物，是老舊的東西，一定是提倡西方現代文明的障礙這種說法，根本沒有根據。因為西方並非如此，西方的現代文明始於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最早就是恢復古典研究。

日本也一度講全盤西化。日本人稱之為入歐，「去亞入歐」，放棄亞洲。可是這種想法沒有持續很久，馬上就引起國粹派反對。國粹這兩個字，中國人是從日本那裡學來的。國故是章太炎先生提出的。講國粹實際上是日本名詞。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日本早就認定要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上吸收西方的新成分，而且他們做得很成功。

我希望香港中文大學能保持它的創校理想，中西結合，永遠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像錢

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潤孫先生和錢先生的學生嚴耕望先生都是過去在中國大陸培養出來的人才。他們不但不反西方，且接受西方觀念，受到國際社會尊重，他們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建設性多，破壞性少。所以香港中文大學這五十年來在中國研究方面有許多建設性成就。

現在最擔心的是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民族情緒高昂。民族主義在國家被侵略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可是如果自己不是處在侵略之中，而是覺得自己越來越強大，要採取高漲的民族情緒來主導，就會很危險，因為德國的希特勒就是如此。日本在1920年代、1930年代以後，也是因為國粹的想法太厲害了。

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缺點，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長處，如果能取長補短，是最理想的。我想香港中文大學在這方面應該取得優勢的，比在大陸的大學都要好得多。因為大陸這幾十年來，到底受了「文革」的影響，一時還恢復不了。

三、保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傳統

我學到一點點的知識都是從香港開始的，我相信香港中文大學能保持它原來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是很重要的。不管客觀環境有什麼變化，我覺得人的作用還是不可低估。用外國人的話說，每個人都可以創造自己的特點，造成不同的後果，不同後果在人，而不是在於事情，也不完全在於制度。所以我相信儒家的話叫「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法律本身制度本身它不會行走，不會動，動的人在後面。只要有這樣的人，就能繼續保持中大過去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風格。

這可以說跟北京大學蔡元培治校時很相似，主張兼容並包，不同東西我們都要，不拘泥一定立場。至少我在那兩年看到，香港中文大學是完全沒有任何限制的，你愛研究什麼就什麼。評教授，升級，主要看他的研究成果，只要是自由研究的成績，都是很好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時候，有好幾位歷史系的同人，就因此得到升等了。有些人連升等都不重視，比如嚴耕望先生是當時全世界上唐史研究數一數二的人物，可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出缺後，他連申請都不肯，他說他不需要教授的頭銜，教授還要搞行政還要參加各種會議，他寧可做他的研究。嚴耕望先生在中大不大說話，是個很老實的人，我後來邀請他到耶魯訪問半年，對學生也很有幫助，他對學生的教育栽培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覺得中大這些光輝的傳統是值得我們懷念，也值得我們繼續欣賞。

香港中文大學這光輝的五十年，在歷史學這一門中，除了我剛才說的錢穆先生、牟潤孫先生、嚴耕望先生外，還有許多，不能一一列出。這些老一輩學人傳下來的史學，在中國大陸院校的歷史系都有相當的發展，所產生的歷史人才也相當不少，我個人在海外遇到的歷史系畢業生有不少成就輝煌，也有回到香港教書的。今後歷史系要保持過去傳統，必須不斷努力。一方面要瞭解世界史學發展情況，另一方面，歷史系有個重要任務，就是推廣比較歷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的新進展。比較歷史學並不簡單，不是說拿一件中國的事與西方比，而是要看整個歷史發展性質相近的事件，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歷史階段中，它有什麼不同表現，從中得到啟發。比如我們中國歷史，通過比較歷史的研究，或者與西方的，或者阿拉伯的，或者印度的，或者日本的，就會得到不同認識。中國歷史不只是中國歷史，同時也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這是比較史學可以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過去在這方面也有注重，但不是很充份。如果在這方面能多下點功夫，不單對香港中文大學，對整個中國的歷史研究都

會有作用的。我看到現在中國大陸史學，許多走回考證的路上，因為大的理論還是不能碰，禁忌很多，所以比較歷史研究在大陸不能推展。如果在大陸不能推展，大陸的學生繼續到香港學習，大陸學者到中大教書，在比較史學方面恐怕還不能馬上起很大作用，所以中大在這方面的角色很重要。

文化為人而活

我們常說中國跟西方不一樣。有的說中國落後，西方比中國走的快，所以中國下一步就跟西方像了，再下去就可以趕上西方了；西方走在前邊，中國走在後面，彼此都在一條路上；但另外一種說法認為中西方本來走的路並不一樣。

人類的歷史文化，大體上衣食住行全世界沒什麼不同，如果完全不相同，兩種文化之間的人就不能交談。可見，彼此文化相同是基本的，不同的地方非常少，但非常重要，這就變成各自的特色。五四時期把民主、科學看成是西方的特色，那是有道理的。西方這種特色從希臘時候就開始了，一直延續到現在；可是中國有另外一套想法，就是中國人以人為重的人文精神。中國人很早講孝敬，講天地之性人為貴，從這個基礎上，中國人某些地方，跟西方不一樣。希臘有民主，可是希臘的民主自由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他們有奴隸，奴隸跟一般人不一樣，可以說還沒有達到做人的資格。中國是所有人，包括幫你做事的人、工人，都是人。我記得朱熹編的《小學》有個故事說，陶淵明送一個工人幫他兒子做事，他就給兒子寫了一封信，說這也是別人的兒子，你要好好待他。中國在公元前開始，還有後來的東漢時代，皇帝下多少次詔令，說不准買賣奴隸，因為「天地之性人為貴」。過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找奴隸社會，我認為是笑話。並不是說中國沒有階級、沒有高下，但中國很早便認為階級上下是可變的，所以一直流行著「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諺語。中國人更不承認奴隸是應該的、永久的、不變的。西方在基督教興起以後，才批評奴隸社會，而西方的基督教，本來是天主教，那又是從另外一個文化來的。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文化有它的特色，就是特別注重人文精神。

我們今天講人權，認為人權是西方的觀念。人權觀念就是尊重人及人的尊嚴。中國接受人權觀念，是毫無問題的。清朝末年，所有接受西方最新觀念的，包括盧梭的契約論，都是儒家。西方這些理念我們在古代就有，孫中山都曾有這樣的想法。但是觀念相近，卻還有制度問題。中國在制度方面並沒有跟上。西方的民主、人權，在法律上有一定的地位。中國的法律跟在西方不一樣，所以這就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確實有不同。清末以來，許多知識人都主張採用一些西方的好制度，便是為此。

我研究中國文化的原因就是希望在各種相同之下，找出它最不相同之處。那不同地方很小，可是非常關鍵。你只要抓住那個不同，而不是從一個方面看，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來它的不同之處。但這個並不表示說這個文化不同之後，就不能改變，西方在改變，中國也在改變。中國吸收西方文化，也吸收其他文化，不然的話，佛教就不會變成我們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了。我們現在講三教合一：儒教、道教、佛教，這是中國特色，其實是吸收了外來文化的成果。從前唐君毅先生打過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他說中國文化，就像《水滸傳》裡一個人物的外號，叫「莫遮攔」，沒有什麼可以遮攔的，什麼好東西，我們都可以吸收。這個說法可能誇張了，但是基本上我認為是有這樣的傾向。所以從這方面看，我們說文化不同，文化有傳統，文化有特色，並不表示文化不能改變。如果看到更好的東西，我們當然要改變，當然要吸收，中國文化也不是保守的。文化是為人而活的，不是人為文化而活的，不能倒過來。

我的研究原則

一、樹立中國的學術尊嚴

其實我在美國工作時，都寫英文，但我的英文著作一般中國人都讀不到。這些年大陸出版了我的一些譯作，其中一部就是長七八百頁的論文集。還有我的專書，原著都是用英文寫的。1973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我就完成了《戴震與章學誠》，這本書在大陸也翻印了。我在美國時也用英文寫《戴震與章學誠》，後來我的英文文章也在美國發表過，所以用中文抑或英文，在我來講是同時進行的。用中文有許多東西可以講得更複雜，更深一點。用英文會因為一般讀者沒有背景知識，必須講得簡單一點。同時你研究中國的東西，用中文來寫，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不但中國的讀者會讀到，而且日本、韓國都是讀漢文的。我去日本訪問的時候發現，日本人對我英文的文章、專書所知不多，中文的卻都知道。從我個人考慮，我覺得應該把中國語言、中國學術的尊嚴樹立起來。不能說我們寫最好的文章、最高的、第一流的就是英文的，第二流才輪到中文。我覺得不應該有這個看法。因為據我所瞭解的，在西方，無論是意大利還是法國、德國，他們水平最高的史學家寫的東西都是用原文寫的，中國人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地位。不但如此，日文的東西，在西方用得非常多，西方的漢學家可能中文還不夠好，但是日文都很好，因通過日本人的研究，可吸取很多資料，然後追溯到原始的材料去。所以只有中國被冷落了，這也是我想多用點中文的原因。另外一個很偶然的因素就是從我離開香港的1955至1973年，中間至少十年以上，我很少寫中文的文章。這是客觀環境使然，並不是說我在美國專門用中文寫文章，事實不是如此的。

二、通古今之變

別人看起來我研究面很廣泛，這跟我想全面瞭解文化有關係。為什麼中國會發展為1950年代的中國？一定有它的歷史背景，這是我要瞭解的。我不是為了研究古代而研究古代，而是為了瞭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的思想為什麼變成那樣一個狀態？這必須要求之於幾千年，至少三四千年的歷史，從商周開始，中間決不是偶然的，決不是現在社會科學家研究今天的經濟、社會結構所能瞭解的。西方的社會科學研究有個很大的特色，也可以說是缺點，就是他們著重研究現代，而且常常用問卷的方式，看社會如何回應，從裡面找到結論，看現在人怎麼想，解釋現在社會結構是怎麼形成的。我認為這不足夠。社會結構的變化不是一天忽然發生的，而是慢慢轉變過來的，所以要全面瞭解，通古今之變，是中國的司馬遷開展的傳統。如果你不知道過去，也不可能知道今天，這就是我為什麼寫東西範圍那麼廣、時間那麼長。

當然寫東西跟特殊情況有關，比如說剛好開個會議，要求寫某一類題目，時代或在清朝或在民國或在五四，我往往都不推辭。那是偶然，但偶然中間有必然，那個必然就是我想從古至今有個貫通式瞭解，追求通古今之變，這是我的指導原則。

當然新的東西我也有興趣，我的興趣很廣泛，常常不願意老在一個地方呆太久，我覺得要有新的探險，在探險中能得到許多知識和樂趣。同時因為我想要貫通中國歷史，所以每個階段每個重要的時代，希望做些專題研究。我退休到現在十一年了，研究重點是朱熹，寫成《朱熹的歷史世界》兩大冊，有一千頁、七十萬字，不單講宋代的儒家，而是從古到今的儒家是個什麼性質。我和現在許多哲學家、哲學史家觀點不同，包括唐先生在內，我的看法都有所

不同，也不完全相反，但用不同的觀點來觀察。最近幾年我主要寫的是論天人之際，這可能是我做專題研究的最後一本書。（按：《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已於2014年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和北京中華書局分別以繁體字和簡體字刊行。）年紀大了，做很細緻的工作不大容易了，以後只能寫些一般性的，但有新觀點的文章，不需要做專題研究，不要天天跑圖書館。我想改變方式，晚年寫我所看到的，比較大的觀察，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呈現出來，以後別人認為有價值有興趣可以繼續，或者贊成支持或者反對改正，都可以的。所以我以後和以前的工作大概會不一樣了。

本文摘錄自《貫古通今 融東會西：扎根史學五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2016年。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版權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